

市民社会的 帝国

(英国) 贾斯廷·罗森伯格 著
洪邨生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现实主义
国际关系
理论批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 / (英)
罗森伯格著; 洪邮生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9
(现代政治译丛)
ISBN 7-214-03156-6

. 市 罗 ... 洪 国际关系理论 -
研究 . F8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53147号

The Empire of Civil Society
A Critique of the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pyright(c) 2001 by Justin Rosenberg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c) 2002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erso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02-039号

书 名 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
著 者 (英) 贾斯廷·罗森伯格
译 者 洪邮生
责任编辑 杨 健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人民印刷厂
印 刷 者 连云港海狮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9.5 插页2
字 数 229千字
版 次 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156-6/F·690
定 价 18.0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主编 吴 源

策划 余江涛

如果帝国被认为意味着政治控制超越原有共同体领土的扩张以便增加来自外部的资源，那么最终这预示着帝国的终结。相反，它则意味着帝国权力的行使——就像国内社会权力的行使那样——有着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关注国家体系管理的公共政治方面，另一个是影响剩余榨取和传接的私人政治方面。它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帝国，即市民社会的帝国的兴起。

前 言

本书论点所可能具有的说服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别人的批评、鼓励和建议。伊恩·罗克斯伯勒和尼科斯·穆泽里斯是伦敦经济学院两位模范的博士生导师；在我提交博士论文前的最后准备阶段，马戈特·莱特对它的编辑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本书论点还得益于埃伦·伍德对该论文宽厚但目光锐利的评阅，他审读出我未能纠正的若干缺点和未能察觉的若干局限。最后，有两人从一开始就与本书有关，理应在此特别提及。弗雷德·哈利迪以身作则，最早引导我步入国际关系学科，此后，他的榜样及其对我从事本书的研究予以的热情鼓励一直激励着我。同时，西蒙·布罗姆利在每一个阶段都慷慨地奉献出了他的时间、耐心和惊人的学识，我从中获益匪浅并铭记在心，没有他的支持，结果将会迥然不同：本书将远为逊色。书中依然存在的缺陷和遗漏概由本人负责。

本书第一章前稿已以“现实主义怎么了？”为题发表在《国际研究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第16卷（1990年第4期）上；第三章的内容是发表在《国际研究评论》第18卷（1992年第2期）上、稍作修改了的“神秘的国家起源：国家利益的结构基础”一文；第五章的部分内容曾提交给1992年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召开的政治学学会年会。

目 录

前言	1
导言	1
第一章 现实主义的麻烦	11
阐述现实主义：E.H. 卡尔和国家中心观	12
原理现实主义：摩根索的政治学法则	18
沃尔兹的理论现实主义：偶然会发生	27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	34
结论：现实主义缺少了什么	39
第二章 社会结构与地缘政治体系	49
乌得勒支，1713年	50
怀特与现实主义历史的局限	54
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	59
社会结构与地缘政治体系	67
第三章 神秘的国家起源	82
现实主义的历史合法性	82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86
古典希腊.....	101
国家利益的结构基础.....	109
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	113
结论.....	116
 第四章 现代早期欧洲的贸易和扩张.....	130
葡属东印度.....	133
新西班牙.....	148
结论.....	164
 第五章 市民社会的帝国.....	179
市民社会的结构基础.....	180
作为资本主义政治形态的主权国家.....	183
主权国家体系.....	186
绝对主义主权的问题.....	192
均势的历史化.....	196
卡尔·马克思的无政府理论.....	200
 第六章 另一种国际体系史简介.....	232
方法.....	232
材料.....	235
结果.....	243
结论.....	246

一种有“本体论深度”的视角
——罗森伯格《市民社会的帝国》评介.....255

参考文献.....281

译后记.....295

导 言

若干年前，人们传说着一则有关剑桥大学某学院的故事，当时主持该学院的是一位非常保守的院长：

某个年轻人刚刚被遴选为学院评议会成员，他在所参加的第一次评议会会议上冒冒失失地对学院的政策提出了一大堆措施建议。院长听着听着皱起了眉头。当那位新任评议员的话音刚落，他说道：“很有趣……但在我看来，您的建议似乎与学院传统有些矛盾。”“一点也不，院长”，雄心勃勃的改革者答道。“我已经研究过了学院的历史，我敢肯定，我的建议与过去三百年来学院的风格完全保持了一致。”“这大概不错”。院长说道。“但您不同意过去三百年至少是个例外吗？”

当然院长是正确的，过去三百年中发生的有些事使它们与人类历史中的所有其他时代区分开来。在国际关系领域，这种情形尤其明显，因为这几个世纪首次见证了覆盖全球的国家体系的兴起。在任何其他领域，这种情形也是明显的。事实上，无论何时当我们使用“现代性”这一术语时，我们就在重申时代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即某种结构的非连续性的观点，该鸿沟将世界曾

有的方式与现有的方式分离开来。

什么是这种结构的非连续性？这是一切试图系统地理解现代社会的社会科学所面对的第一个、也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它吸引着18世纪和19世纪几乎所有的主要思想家，他们现在被认为是现代社会思想的前驱和奠基人，从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家到黑格尔，从英格兰的政治经济学家到大革命后的法国社会学家。无论他们在何种意义上回答这一问题——是从基于身份的社会到基于契约的社会之变迁、或是以机械关系而不是以生物关系为特征的社会，是以工业阶级代替尚武的阶级、或是以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几乎所有这些探讨现代世界特征的努力都始于强调它与以前世界如何的不同。

的确，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种对社会巨大变迁的认识完全可能使社会科学与政治哲学区分开来，其途径在于揭示他们所知道的世界在多大程度上实际上并不是普遍的万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是基于传统的特殊社会关系日积月累的结果，这种特殊社会关系决定了特定类型社会。对于这一观点，奥古斯丁·蒂埃里在他有关法国大革命影响的著述中作了极为雄辩的阐述：

对于叛乱和征服、帝国的解体、君主国的衰败和复兴以及大众的革命和随后的反革命之真实情况，生活在19世纪的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所知道的无不要比维利、马布利、甚至伏尔泰本人还多……过去50年中发生的前所未闻的事件教会了我们怎样去理解中世纪的革命，去认识编年史家的文字背后的精神，去从本尼迪克会士的著述中汲取那些有教养的人士从未发现或者仅仅是部分发现了的东西，这些东西的意义却不容置疑。他们缺乏对社会嬗变的理解力和情感。他们以好奇之心研究法律、公众行为、司法程序、私人契约等

等……但他们缺乏皆存在于死板文字背后的那些活生生的政治感知，缺乏对社会及其各种成分的认识。我们则是通过自己的经验获得这种认识，这又归功于在我们面前发生的力量和社会的巨变。

当然，一旦领会了上述有关过去的观点，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从历史的、反映特定社会特征的特殊社会关系的角度来思考我们本以为理所当然的现代社会形态，如市场、国家和个人。

可能依据不同的政治观，人们或是将历史和社会学结合起来，或是将二者分离开来，两种观点同样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那些早期研究现代性的理论家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没有从对社会科学进行学科划分的意义上来思考。而现在人们把学科划分视作当然，如由于亚当·斯密对所有“非经济”因素无情的外化，他可以勉强地被说成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就像马克思主义能够被纳入正统社会学的范畴那样。这样做的原因在于，超乎于社会现实之上的学科划分方法把有关现代世界的某些基本的东西当做自然存在的（因而忽略了它们），而对斯密和马克思来说，它们似乎都是重要的、需要解释的。

这种情形最清晰的例证是政治学和经济学学科的划分，它们的正式分离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之前的19世纪70年代所谓“边际主义（marginalist）”革命后纯经济学的诞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正是基于这种分离的若干学科中的一个，专门研究国家间的政治关系。许多年来，不少评论者（例如E.H.卡尔）指出，这种分工无助于探讨真实的世界，国家毕竟在照例干预市场，对它进行规范和约束，而市场产生的作用也影响着国家的行为。这种认识晚近还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新的领域的兴起，它研究的重点完全集中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因果

互动， 可以被看做是强烈反对国际关系和经济学学科分野的某种创新。

它可能的确是一种创新，有关“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饶有兴趣且很重要的问题。然而，它仍然把以下的认识当做它的起点：国际体系包括政治和经济性质截然不同的制度领域。这一起点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事实上，作一个历史考察就会表明，这一起点或多或少对于现代世界是独特的； 如果这些社会形态果真是崭新的，那么就会出现进一步的问题：现代国际体系为什么采取它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形态，即国家和市场？由于这个问题不可能根据国家和市场不可通约的属性来回答，这使我们又要提出确实更为基本的问题：在何种社会中政治和经济不同的体制范围能够如此表现出来，为什么？当这种情形发生时实际发展又将如何？如后文我希望阐明的那样，回答这些问题可能会告诉我们有关社会力量的现代形态的某些东西，而只要把国家和经济体当做社会现实的基本成分，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它们。

然而，就目前而言关键只是在于，为了提出这些更为深刻的问题，我们需要置身于现存的学科界限之外并像早期的社会理论家那样从整体社会——社会整体论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事实证明，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工本身是在不加批评地考虑与众不同的现代社会形态因而使之习惯成自然。国家、市场、个人，这些恰恰需要我们作出解释的事情已被当做理所当然的起点。通过把现代社会关系的特定结构彼此割裂和理论化，这种学科分工导致把它们具体化为自成一体的角色，具有自己不同的特征，而掩盖了这些社会形态的历史本来面目和构成它们的特殊的社会关系；进而言之，它还造成思想的固步自封和对人类共性的视而不见，即限制了对人类合作可能性的认识。

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欧洲人来说，现代社会世界（social

world) 仿佛是在平地一声惊雷中到来的——对此他们不会弄错（即使未必能够理解），随后便归于沉寂、不留痕迹。

人们会争辩说，社会科学的真正任务不应是去认同上述过程，而是恰恰相反：通过表明我们周围的世界与此前各社会的区别所在来揭示它不是自然形成的；将国家和市场这些具体化了的社会形态回归到构成它们的历史上特定的人类社会关系之中；最后，追寻我们过去的足迹以重新发现我们现代社会世界的兴起和发展——那些“真正的、充满生气的个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历史。

现在，如果我们将此界定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的工作，那么国际关系学科在探讨自己的论题中是否有任何理由应该在方法上与众不同呢？对许多秉承仍然占支配地位的现实主义传统的著述者来说，这几乎是毫无疑义的。

在他们看来，国际关系学科存在的前提是承认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根本性的分离，前者由协调的、和谐的主权国家来实施，而后者则为不可抗拒的无政府逻辑所支配。探讨这种无政府逻辑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理论特有的任务，它或严或松地必须与国内政治的研究分开，因为研究国内政治是受到根本不同的原则所支配的。通过参照有关的社会内部特点来解释国际后果的尝试（常常正确地）被看做是一种对外部因素视而不见的、粗糙的简单化。因为这些理由，在任何根据经验的重新建构中无论会有什么要求，国际关系理论也不去追溯地缘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结构之间的联系。正如肯尼思·沃尔兹所指出的：

国际政治的研究者专注于分离开来的国内政治理论 and 国外政治理论，直到有人找到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办法，他们会干得很好。

这里的问题是，一旦国外政治理论以这样的方式任其自流，对以

上讨论的社会形态的简单化确实会不可避免，因为构成它们的社会关系在“国内政治”的名下已经不在考虑之中。根据定义，一种分离开来的国外政治理论必须把国家作为它的研究起点。

如果人们能够比较历史上不同的地缘政治体系并能理解它们的真正区别何在，上述损害或许可以得到部分的弥补。例如，很难想像一个人能够解释封建地缘政治中王朝外交的作用——或者在现代世界中王朝外交不起作用——而不考虑有关社会的内部特征。但是，这种考察受到了对历史比较研究明显忽略的阻碍，它使我们应当尝试解释的真正的现代性隐而不见。在此沃尔兹也许是最走极端的一个：

国际政治的持久特点解释了国际生活性质显而易见的、贯穿数以千年的同一性，这一表述会得到广泛的赞同。

持有这种看法的远不是他一人。罗伯特·吉尔平断言：“国际关系的性质数千年来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人们可以经常看到，意大利和希腊城邦国家体系被引为势力均衡永恒性的例证。

结果，批评家们常常观察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终结于现代地缘政治的简单化、忽略历史比较，以及制造了一个国家体系的模式，该模式除了大国的兴衰的确看不到历史的变化。

本书的目的是为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关系之重新定位作出贡献，该学科应符合上述社会科学共同职责的要求。这就是寻求：（1）鉴别现代国际体系区别于历史上所有其他地缘政治体系的方法；（2）将这种对比融入某种对现代世界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结构的更为广泛的理解之中；（3）表明这样一种视角如何改变我们所寻求的方法，用以恢复国际体系过去并且现在继续发展着的历史。这些目的的每一个都要求以稍有区别的观点批判性地处理现实主义的正统性，而如果说有一个涵盖所有这三个目的

的统一主题的话，简单地说这就是：地缘政治体系的结构不能独立于、对它的理解不能孤立于社会生活中更为广泛的生产和再生产结构。

本书的论证分为三个主要部分，每一个部分构成两章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对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理论即现实主义作一个理论性的批判。第一章利用了该学派三种最有影响的著作，以便依次集中在它的阐述性、原理性和社会性之理论表述。现实主义理论的关键弱点是它的非历史和前社会学的特征，它的主权和无政府状态两个范畴尤须注意，以便后面对它们进行重新定义。第二章进一步发展了以上观点：它始于举例说明现实主义理论是如何限制人们对国际体系作历史的思考，它认为，无政府状态的非历史问题应该为另一种问题即社会学的现代性问题所替代。为此目的，这一章考察了现代社会理论中某些关键的争论，勾勒出广泛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然后挑战现实主义的原则——学科论题中的地缘政治之核心就本体论而言区别于更为广泛的社会再生产结构。

论证的第二部分包括对若干方法的一系列历史解释，根据这些方法，社会结构影响着地缘政治体系。第三章探讨国家自主的概念，该概念是现实主义有关存在某个独立的地缘政治领域的论断之中心。通过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古典希腊的国家体系进行对比，该章试图表明，在每一种国家体系中国家的形式具有针对特定的社会的特殊性，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理解它们表面的相似性。这种相互关联对国家力量的特点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缘政治体系的发展轨迹也均具有重要影响。人们通常利用这些例子来论证特殊的国家体系之间跨历史的连续性在这里受到了直接的挑战。在第四章中，研究转向了现代世界市场的某些前现代，即作为绝对主义时代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国特征的交换关系结构和帝国扩张

形式。这里该章将阐明，葡萄牙帝国宗主国社会的前资本主义特征是与现代世界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一套交换关系的基础，而在西班牙帝国，扩张动力和殖民化形式都被打上了原有社会结构的烙印。

论证的第三部分最终回到现代，它寻求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理论发展为另一种选择，即建立理解现代国际体系的非现实主义框架。上面列出以作重新定义的两个核心的学科范畴——主权和无政府状态——现在特别需要从前述历史和理论研究的角度进行再考察。在现实主义者看来，这些范畴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与更为广泛的其他社会科学的分离；这里对它们进行再考察的目的则相反，即揭示出若干方法，通过应用这些方法人们可以看到，现代国际体系明确无误的是由主要民族国家构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第五章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国家观念的讨论对“主权”概念作了重新界定，继而提出，马克思还提供了一种人们未加评述过的“无政府状态”理论，它乃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独具特色的社会形态。最后，第六章对马克思有关“原始积累的奥秘”的讨论进行了发展，以提供作进一步历史研究的论题，该论题涉及对国际体系的兴起和演进迥然不同于学科正统理论所假设的历史表述。

以上的章节安排是在我四年多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形成的，现在其顺序实质上未作变更，而对它的进一步考虑本应从一开始就进行。这种选择的不利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论证随时间推移展开，章节的顺序反映了这一点。的确，如果本书现在以结论部分的章节为开端重新写来，就将会出现某种不同的结构；如果论证的目的事先挑明，它本来随后会有某种更为直接的路径，其起点将比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更有希望。另一方面，对现实主义长处和弱点的争论确实仍然是国际关系学者无法避免的研究的开端；对这类读者来说，一部始于有吸引力的熟悉的争论、

然后致力于某个迥异的知识领域的著作，可能比一部一开始就在公认的学科边界之外构筑自己营垒的著作更为有用。因此，如果本书在追溯一条超乎现实主义的可能道路——尽管存在着不平衡和性质的变化，下面的论证将更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

注 释

E. 赫勒：《艺术家的探秘之旅》（F. Heller, The Artist's Journey to the Interior），伦敦1966年版，第3页。

引自G. 塞博恩：《科学、阶级和社会》（G. Therborn, Science, Class and Society），伦敦1976年版，第172—173页。

E. H. 卡尔：《二十年危机》（The Tweney Years' Crisis），伦敦1946年第2版，贝辛斯托克1981年重印，第116页。

苏珊·斯特兰奇的著作提供了在这些意义上阐述国际政治经济学任务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主要例证。参见她在《国家和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Susan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988）一书第13—14页中的讨论。

“对我们来说，无论作出那样的假设看上去是多么的自然，它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我们大家极易忘记的那样，市场经济是一种仅仅存在于我们时代的体制结构……”见K. 波拉尼：《大变革》（K.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波士顿1957年版，第37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2部分），帕斯卡尔编（The German Ideology, ed. R. Pascal），纽约1947年版，第15页。这种职责不应与这些社会关系的实际交叉混淆起来，它们依靠物质力量关系来维持。无论人们多么希望肯定人类自我认识的潜力释放，力量结构显然不会因而仅仅通过对异化的社会形态的重新认知而瓦解。这种缺陷对从事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有着某种职业伤害，但似乎更使具有现象学倾向的社会学家和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者苦恼之至。这里的后一种情况——可能还包括某种当代“批判理论”对认识论的关注——尤其令人迷惑，因为在《德意志意

意识形态》的开篇部分，那种“哲学评论家们”的“天真幼稚的空想”受到了无情的讽刺。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嘲讽如下：“他们头脑的产物统治了他们。... 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一个人说，只要我们教会他们如何用符合人的本质的思想来代替这些幻想；另一个人说，只要我们教会他们如何批判地对待这些幻想；还有个人说，只要我们教会他们如何从头脑里抛掉这些幻想，这样... 当前的现实就会崩溃。”（马克思，上引书，第1页。）（参见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中文版，第15页——译者注）相反，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拜物教”是人类行为实际异化过程中的观念成分，而这种人类行为源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意识能够理解它，但其本身不能消除它。如塞耶所指出的：“物化是一个社会过程，而不是纯粹的范畴错误。”见《资本主义与现代性》（Sayer,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伦敦1991年版，第65页。

例如，沃尔兹说：“国内体系是集权的、等级化的。... 国际体系是非集权的、无政府的。两种结构的秩序原则大相径庭，实际上是相互对立。”见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Keohane,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纽约1986年，第81页。同上书，第340页。

同上书，第53页。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R.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剑桥1981年版，第211页。马丁·怀特以此作为问题“为什么不存在国际理论”的答案：“如果托马斯·莫尔爵士或亨利五世... 看到... [1960年的]国际舞台，他们很可能要为它与他们所记得的情形的相似而大为惊讶。... 舞台变得大多了，角色变少了，它们的武器更惊人，但表演的还是同样的旧情节剧。国际政治是一个同一事件再三出现、重复发生的领域，在该领域中政治行为是最有规则的要素。”见“为什么不存在国际理论”，载于H. 巴特菲尔德和M. 怀特编：《外交调查》（Martin Wr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H. Butterfield and M. Wr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伦敦1966年版，第26页。